·专题研究·

DOI:10.20004/j.cnki.ujn.2025.05.017

以“改变世界”为己任的哲学何以可能

——论马克思哲学的开放性品格

杨　鹏

(山东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摘　要]马克思哲学的开放性,是根植于其“改变世界”这一理论诉求之中的。马克思哲学将实践作为原初基础,以为共产主义运动提供有效行动指南为己任,保证了自身向实践的开放性。马克思哲学将共产主义作为“立脚点”,以此为圭臬反思和引导人之能动性的展现和落实,保证了自身向未来的开放性。马克思哲学以“人的在场”为理论前提,通过对唯物史观这一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把握,使哲学研究以“从后思索”的方式在理性而非知性层面展开,保证了自身向历史整体的开放性。马克思哲学以自我批判为内在要求,在反思总结实践经验并同其它理论对话交锋的基础上,以辩证否定的姿态对待自身全部规定,通过持续的自我革新确保了向理论自身的开放性。

[关键词]马克思哲学;改变世界;开放性;实践;历史思维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842(2025)05-0167-08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强调:“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①马克思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要素之所以能够实现中国化时代化,进而被学者们从不同视角探讨,正是该理论的开放性品格使然。然而,这些集中于背景、表现、要求和意义方面的思考,根本上是以经验直观的知性思维来探讨哲学问题,因而不但无法揭示马克思哲学开放性的真正来源,而且极易将开放性的表现同完整的“思维行程”割裂开来,使哲学本身沦为“抽象的规定”②。同时,这种思维层次的先天不足,致使研究者们无法认识到“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条件的产物”③,从而隐含了背离马克思基本哲学立场的风险。开放性是马克思哲学的内在品格,只有立足于马克思对以往全部哲学及其历史前提的批判,从“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④所确立起的目标以及在此基础上完成的哲学变革出发,才能真正领会其内涵。因为要承担起“改变世界”的重任,马克思哲学就必须具备开放性的品质。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及其关系研究”(项目编号:21&ZD008)。

[作者简介]杨鹏,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研究员,哲学博士,邮箱:yangpeng@sdu.edu.cn。

①《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5-16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29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2页。

二、以“改变世界”为己任的哲学需要向现实实践开放

诚如法国学者巴利巴尔(Étienne Balibar)所说:“马克思是永恒重新开始的哲学家,在身后留下了多处未竣工程。”[①]这些“未竣工程”为学者们提供的诠释空间,成了他们“接着讲”的原初基础。马克思哲学固然直接呈现为一套学说,但马克思本人绝不是要借此打造一个僵死的理论体系,而是期望人们在实际运思的基础上,以实践方式“改变世界”并实现哲学自身的完成。

首先,马克思文本呈现出的非定义特征表明,他的研究活动是一个向现实持续开放的过程。人们几乎很难从马克思作品中找到他对某概念下的定义。笔者认为,一方面,这种表面上的文字疏忽,不仅是马克思有意为之,而且是其严谨求实从事哲学思考和写作的体现。马克思在1843年9月致信卢格,表示“新思潮的优点又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地预期未来,而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②]。然而马克思自始至终没有说明“新思潮”的性质、特征和要求,因为在他看来,哲学研究的核心不在于思考什么,而在于如何思考,即思维方式本身而非具体反思对象。下定义意味着给被定义者以限定,不可避免地使哲学对象化和具象化。如果哲学成为一种已然存在、不再变化的“抽象物”,自然也就无法在实践活动中展现并完成自身了。另一方面,马克思之所以回避下定义,不是要有意模糊甚至否定哲学概念的明晰性,而是寄希望于哲学在面向现实敞开的过程中,将内在属性、品格和特质自行展现出来。这种思维方式不仅有利于防止哲学研究中对思想内在品质和外在表现的混淆,避免将对思想本身的探讨同孕育和产生相关规定的历史语境割裂开来,落入概念思辨的“旧哲学”俗套;同时也有助于规避19世纪甚嚣尘上的直观和实验方法等知性思维对哲学的僭越,确保哲学在进入人的实践领域后,依旧能够长期保持并充分彰显其反思和批判能力。

其次,马克思哲学研究的目标是推动实践,特别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旨在实现每个人自由发展的运动。其全部研究及成果都向现实的革命运动敞开着。马克思不仅关注工人运动的现状和进程,而且多次亲自领导工人运动,但他对“实践”的探讨主要还是以哲学的形式进行的。马克思并不是将“实践”引入哲学的第一人,相反,这是他从德国古典哲学那里继承来的重要思想遗产:黑格尔将“实践”作为绝对精神外化并返回自身的必要中介,认为“实践的意义本身不外就是有理性的意义,即理念的意义”[③];费尔巴哈从感性直观的角度,将实践理解为“由对象而认识人;人的本质在对象中显现出来”[④]的感性存在。古典哲学家们尽管注意到实践本身蕴含了哲学意味,但“实践”在他们那里仅作为完成思辨体系的一个环节,同人的存在和活动是分离的。这种纯粹抽象的概念,显然是无法在现实中展现自身的。相反,马克思将“实践”视为人的能动活动的哲学表达,并将其作为全部哲学的基础确立下来,从而使哲学自身具备了向现实开放的基因。马克思称自己的哲学是“新唯物主义”和“实践的唯物主义”,因为“新唯物主义”的“新”意,就在于以实践而非思辨的方式,使哲学真正承担起为人的存在、发展和解放“立法”的使命。“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⑤]可以说,马克思对哲学与实践关系的揭示,彻底改变了该问题原有的思考角度和回答方式:哲学和实践不再相互隔膜,而是通过彼此肯认来彰显自身。马克思哲学正是在不断向实践开放,积极融入实践的过程中获得生命力的。

---

①埃蒂安·巴利巴尔著,王吉会译:《马克思的哲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页。

③黑格尔著,邓安庆译:《黑格尔著作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50页。

④费尔巴哈著,荣震华译:《基督教的本质》,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3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7页。

最后，同哲学观点相比，马克思希望读者着力关注他通过扎实论证呈现出来的独特思维方式，因为后者构成其哲学得以“改变世界”的缘由。马克思当年一再拒绝将自己划为“马克思主义者”[①]之列，一个重要考量便是担心自己的学说被人们当作“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②]，从而关闭向实践开放的通道，背叛“改变世界”的初衷。马克思哲学通过向实践开放来“改变世界”，并不意味着它要越俎代庖去完成经济学、社会学和法学等社会科学的工作。与后几者不同，马克思哲学意义上的“改变世界”，是以反思的形式在战略而非战术层面体现出来的。他丝毫没有否定实证科学，进而向相关领域僭越的“非分之想”，而是以哲学特有的方式向实践开放。这种开放性决定了马克思哲学不是要为人的具体活动提供手段和工具，而从人的存在方式出发，为其自我彰显和完成提供基本立场和思维方式保障。恩格斯关于“我们（马克思和恩格斯——引者注）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杠杆”[③]的表达，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作为“研究工作的指南”就必须向作为实践活动的哲学研究开放：在对具体问题之历史前提、生成条件、现实要求及未来趋势通盘把握的基础上，做出具体的因而也是历史的分析。同时，向实践开放还意味着马克思哲学不能故步自封：它必须以持续反思和永恒批判的姿态，在实践中不断提升和发展自己。马克思哲学反思和指导实践的过程，也就是其自我彰显、自我超越和自我实现的过程。这本身既是持续向现实开放的前提，也是落实这一基本要求的结果。

三、以“改变世界”为己任的哲学需要向未来社会开放

罗素（Bertrand Russell）是以“试图想象一种比人类迄今存在的破坏性和残酷的混乱更好的人类社会秩序，这种尝试绝不是现代的产物”[④]为引言，开启对马克思与社会主义学说相关论述的。这段引言体现了他对马克思哲学向未来开放这一特征的深刻体悟。向未来敞开并非出于马克思的个人偏好，更不是罗素的牵强附会，而是源自马克思哲学内核的基本品质。

首先，马克思是从实践这一人所特有的存在方式出发展开哲学批判的。实践“不仅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⑤]，以此为根基的马克思哲学必须具备向未来敞开的能力。一方面，尽管人同非人在外部形态、生理特征、生活习性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但是否具有向未来敞开的能力才是更为本质的区别。只有人具备超越性和能动性，“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⑥]。人们通过把握并自觉遵循外物的发展规律，以实践的方式不断“改变世界”来创造“人化自然”，在满足自身需求的同时实现人的自我发展。改变世界的过程，既是人们认识被改造对象本质，把握其发展规律的过程；也是人们展现自身能动力量，确证自身主体效能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哲学语境中的人是具有自我创造性的。“改变世界”依靠的正是人所特有的创造力，其作用发挥即创造活动本身，显然是指向未来的。马克思哲学作为对人及其本质的理论表达，只有符合人自身的存在方式才成为真理，因而也必须具备向未来敞开的品质和能力。另一方面，马克思哲学以实践作为原初基础，彻底扬弃了以往哲学在经验直观和概念思辨间各执一端的思维误区，首次扭转了理论高于实践的思想取向，从根本上改变了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71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562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587页。

④Russell B. ，*Proposed Roads to Freedom*，New York：Henry Holt and Company，1919，p. 1.

⑤《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9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63页。

哲学的存在和表达方式。诚然,“现有之物和应有之物的对立……是理想主义所固有的”[①],它构成哲学存在的前提。但唯有借助实践这种感性活动来“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②],才能将原本作为超越性存在的理想落实到现实社会,并由此“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③]。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属性绝不意味着要逃避或拒斥先验和超验;相反,他是把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的、用以超越经验世界的范畴,借助实践这一“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④]充分展现出来。这种从人所特有的存在方式出发,去寻求超验与经验、未来与当前、理想与现实和解的思路,无疑将理论本身的开放性彻底彰显了出来。马克思哲学作为这一实践过程的理论表达,必须将内在于人的存在方式之中的开放性凸显出来,因而离不开向未来敞开的基本能力。

其次,马克思是在积极扬弃宗教神学和思辨哲学的基础上,确立起“改变世界”这一目标的。这种改变之所以可能,离不开对历史思维的运用。因为只有将未来确立在现实的历史进程之中,以历史条件的不断成熟推动原本作为“未来目标”的实现,这种理解和把握未来的方式才是真实而非虚幻的。马克思不是首位将历史引入哲学领域的学者。恩格斯曾明确表示说:“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做基础。”[⑤]然而,与黑格尔不同的是,马克思明确将实践而非精神确立为哲学的原初基础,使黑格尔哲学“巨大的历史感”在现实世界获得落实。同时,马克思哲学的“历史感”建立在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整体把握的基础之上,“不仅仅提供对过往历史的解释,而且更希冀成为创造历史的指南”[⑥],从而使自身具备了观照未来的本领。“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⑦],绝不意味着马克思要借否定其它学科来标榜历史学;而是强调运用历史思维,将全部哲学探讨确立在“改变世界”的历史进程中,并通过实践活动的能动性和创造性,避免学说自我封闭,保障理论自身持续向未来敞开。海德格尔关于“马克思在经验异化之际深入到历史的一个本质性维度中,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比其他历史学优越”[⑧]之论断,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提出来的。异化并非伴随人类社会始终,它只在特定历史阶段具有必然性,因为“异化借以实现的手段本身就是实践的”[⑨],而社会历史性正是实践的基本特征之一。异化根源于私有制的存在,扬弃异化要以全部私有制及其历史基础的彻底瓦解为前提,因为“废除私有财产……只有通过社会的物质活动才有可能,而决不能把它理解为用一种范畴代替另一种范畴”[⑩]。这一活动的有效展开,有赖于相应历史条件的成熟,而马克思对这一系列非“在场”的历史条件的把握,依靠的正是其哲学本身向未来敞开的内在品质。

最后,恩格斯认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⑪]。这一评价无疑是公允的。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性”是最为深刻和彻底的,因为他不仅彻底批判了旧有和现存的制度安排,而且提出了未来社会的建构原则。马克思哲学以实践的方式回应时代关切,在对未来社会的建构方式层面,完成了同一切“旧哲学”的割席断交。马克思哲学力求通过社会关系特别是生产关系的改变,培育并塑造每个人的“此在”性,由此完成对一切存在压迫和剥削的社会形态和制度安排的历史扬弃。马克思哲学以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7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4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499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5页。

⑥Heilbroner R. L. ,*Marxism:For and Against*,New York & London:W·W·Norton,1980,p. 80.

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16页。

⑧海德格尔著,孙周兴译:《路标》,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403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65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55页。

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2页。

每个人历史解放的完成和自由王国的来临，而不是思想理论的包罗万象为最终目标；同时又立足现实来观照未来，从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来批判和改造现实。因此，巴利巴尔才不禁感叹道：“马克思以后的哲学不再是以前的哲学……因为它不只是要求改变观点和方法，而是要去转变哲学的实践。”[①]严格来讲，巴氏并没有真正理解“实践”在唯物史观的位置。因为马克思不是要“转变哲学的实践”，而是要“转变哲学的存在方式”，使哲学真正从“现实的个人”出发，成为每个人自由发展的理论表达。马克思从未刻意将自己打扮成一个革命家，而是当时西欧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所要求的。面对劳资矛盾日益尖锐、城乡差异日趋明显、东方逐渐从属于西方的现实，要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就必须对资本主义及其制度安排进行彻底革命，扬弃私有制得以存在的历史前提。这既是马克思哲学持续向未来开放的表征，更是其能够承担起“改变世界”重任的缘由。

四、以“改变世界”为己任的哲学需要向历史整体开放

马克思哲学能够“改变世界”，前提在于它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进行了全面把握。因此，列宁说：“能对某一社会形态作出严格的科学解释并给以生动描绘的尝试以前，唯物主义历史观始终是社会科学的同义词。”[②]唯物史观的科学性离不开其自身蕴含的开放性品格，即通过对具体问题给以历史地分析，从而向历史总体开放的属性。“历史”在马克思那里主要是作为思维方式，而非研究对象存在。马克思不否认历史作为对过往事实概括的内涵，但这些事实根本上还是人们在具体的因而是历史的社会关系中进行实践的产物，因而，历史思维不仅能够反思过去，而且还要具备观照未来的效力。同时，借助于向历史整体开放，马克思哲学的解释力不断增强，也有助于推动实践走向深入。

首先，向历史总体开放是马克思哲学思维前提的要求。“新唯物主义”之“物”不是预成的，而是在实践方式生成并确证的客观实在性。这正是马克思哲学超越旧唯物主义，获得“现实性”的原因所在。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宣称，马克思哲学“原本想要反驳思想支配历史进程这个观点，但它自身对于人类事务的影响程度削弱了它的观点的力量。由于在迄今为止的、力图改变个人与环境和同伴关系的流行观点中，它已经明显地改变了这种关系本身；因而，它仍然是当今正在永久改变人们思考和行动方式的知识力量中最强大的一支”[③]。不可否认，马克思哲学在指导工人运动的过程中转变成的物质力量，“极大推进了人类文明进程”[④]。然而仅凭这类事实能否驳倒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原理呢？答案是否定的。马克思曾批评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⑤]，这点无疑也适用于伯林。因为他们都未从感性活动即实践的主体角度来理解人，而是将“唯物主义”之“物”误认作未经人类染指的“纯粹自然”，错误地将自然与历史割裂开来。这种思维方式必然将“人”同作为其存在方式之现实表征的历史剥离开来，以对待“物”的方式来理解人，从而使人在其哲学体系中被彻底抽象化。马克思认为即使把握并遵循了历史规律，也只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而无法“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⑥]。“无法取消”意味着人类社会的规律不是自在世界的抽象逻辑，而是在实践中展现的历史逻辑，规律的有效性是历史的而非永恒的。这充分证明了逻辑从属于历史，而不是相反的道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

①埃蒂安·巴利巴尔著，王吉会译：《马克思的哲学》，第6页。

②《列宁专题文集. 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第163页。

③Berlin I. ，*Karl Marx: His life and Environment*，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 267.

④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1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0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页。

源。实践发展永无止境,我们认识真理、进行理论创新就永无止境。”[①]正是凭借向历史整体敞开的姿态,马克思哲学不断进行自我批判,在持续创新中保持了自身的生命力。

其次,向历史总体开放是马克思哲学本身思维层次的要求。部分学者未达到唯物史观的高度,以知性思维误读、曲解甚至矮化马克思哲学,由此产生的问题都不能归咎于马克思哲学本身。例如罗素就曾质疑说:“时间已经呈现出了马克思理论的诸多纰漏。世界的发展已充分证明,他是一个具备超凡洞察力的人,但是,这一发展趋势却并没有充分证明政治或经济的历史完全契合他的预言。”[②]诚然,随着民族独立运动兴起和社会保障体系完善,严格来说,雇佣工人们都不再“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得一无所有”[③]了。但当金融危机来临,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大量失业、市场和政府双重失灵等,都以事实证明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没有改变,工人阶级依然是被剥削的对象,马克思的分析依然有效。同时,罗素以事实同理论不“完全契合”来否定马克思学说的真理性,在思维层次上是以直观来反对理性的实证主义,其哲学基础是以逻辑反对事实并试图将历史从属于逻辑的唯心主义。马克思曾明确表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④]共产主义作为“现实的运动”不过是持续向历史总体开放的动词化表达。那种以经验直观的知性思维,强迫现实与理论相契合,这种无法向历史总体敞开的思维方式,显然无法理解马克思的共产主义。

最后,向历史总体开放是马克思哲学思想内容的要求。马克思终其一生的哲学研究不过是为了回答“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何以可能的问题,因而不可避免地蕴含了彼岸性的基因。《资本论》中关于“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⑤]之论述,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诚然,作为一位19世纪的犹太裔博士,马克思不能不受到当时充斥于西欧地区的浪漫主义思潮,以及来自家庭的犹太教弥赛亚情结的影响,但这并不构成马克思的“自由王国”是乌托邦、马克思哲学是浪漫主义说辞的理由。因为评价一种哲学的理论品格,主要根据的不是其思想前提而是对这些思想元素的处理,即思维方式本身。“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⑥]马克思以实践作为其全部哲学的原初基础,将全部范畴和命题都回归到它们产生和存在的具体历史条件中,从物质生产关系而非范畴的逻辑关系出发“改变世界”,从而永久铲除了各种朴素经验论和独断论的根基,完成了理想向现实的有效转化。马克思哲学向历史整体开放,既是不断深入把握历史规律的过程,又是顺应历史趋势并运用历史规律改造世界的过程,还是将以往全部哲学作为环节和要素批判地纳入自身建构中,从而在超越以往哲学的同时完成哲学变革的过程。因此,马克思哲学要实现“改变世界”这一理论诉求,就必须始终保持向历史整体开放的姿态。

五、以“改变世界”为己任的哲学需要向理论自身开放

马克思哲学凭借实践这一原初基础,在获得自我革新能力的同时,充分彰显出向理论自身开放的品格。马克思哲学以“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为信条,要求其自身必须以开放的姿态,通过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4页。

②Russell B. , *Proposed Roads to Freedom*, p. 25.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97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9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28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92页。

持续的自我批判，始终保持与时代同行。这也是“不断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①]，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哲学依据所在。

首先，向理论自身开放是马克思哲学自我批判性的要求。马克思的大量作品以“批判”作副标题，这种“习惯”绝非其个性或表达偏好使然，而是植根于其特有的思维方式之中。马克思哲学的“批判”旨趣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就实践层面而言，批判强调改造客观世界，进行“人化自然”；就理论层面而言，批判则表现为自否定的辩证法。后者作为对前者的学理表达，要求马克思哲学必须向理论自身开放。“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②]，因而必须以永恒的批判姿态对待现存事物，当然也包括马克思哲学自身。马克思哲学借助自我批判将全部范畴回溯到其历史条件，从现实的生产关系中引发出“改变世界”的力量，并随着相关历史条件的成熟与完善，不断实现理论自身的超越和提升。马克思哲学对自身的批判是在不受任何外力胁迫下进行的，因而其全部规定也都是自我适用的。这避免了“将辩证法的使用贬低为同感觉或意识相冲突”[③]，将哲学作为外在于人的对象谈论的弊端。马克思哲学以人的“亲在（Dasein）”为基础，在辩证思维引导下保持批判和追问姿态，通过不断的自我革命来完善自身。这种向理论自身开放品质，是马克思哲学永葆生机活力，长期有效指导“改变世界”的关键所在。

其次，向理论自身开放是马克思哲学应对各种理论和实践挑战的要求。同任何著名的思想学说一样，马克思哲学自诞生之日起便受到多重质疑。这其中固然有阶级立场和社会环境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但更多还是人们对马克思哲学开放性品格的理解程度欠佳所致。当资产阶级学者声称共产主义将消灭个性时，马克思并没有直接从正面反击，而是回到这些观点所依附的生产关系，以驳论的方式再次证明并捍卫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马克思说：“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④]要实现每个人自由发展就必须“消灭资产者的个性、独立性和自由”[⑤]。资产阶级的全部哲学都建立在私有制的经济基础之上，其所谓的“自由”不过是“自由竞争”的代名词，因为“在自由竞争中自由的并不是个人，而是资本”[⑥]。这意味着私有制在根本上导致了人的全面异化，阻碍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王国的来临。正因如此，马克思才将“消灭私有制”作为无产阶级中的最先进力量，即共产党人的理论概括[⑦]。同样地，共产主义消灭了私有制却不会出现资产阶级担忧的普遍怠惰，是由于生产关系转换使得“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⑧]。人们依据自身兴趣和能力从事劳动，每个人的个性都能得到充分尊重，自由发展也就具备了历史条件。这种生产关系怎么会让人们怠惰呢？马克思哲学“改变世界”的能力是以其强大解释力为前提的，这种解释力是在同其他思想交锋并回应各方质疑的过程中确立起来的；同时，马克思也自觉将相关学说的合理成分，批判吸收到自己的哲学建构中：这两个方面都充分显示了马克思哲学向理论自身开放的品格。

最后，向理论自身开放是马克思哲学立脚点的内在要求。“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

①《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第251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2页。

③Heilbroner R. L. ，*Marxism：For and Against*，p. 41.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6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7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79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5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35页。

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①]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充分说明,仅仅“宣布”马克思哲学的正确性,并不能真正“保卫马克思”。要有效“为马克思辩护”,除了依托共产主义运动这一“实践能力的明证”[②]外,还要在理论自身的彻底性上下功夫。具体而言,就是要揭示“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即共产主义的内在逻辑,并以反思和批判的姿态对待全部研究及其结果,不断从历史、实践和相关理论中汲取营养,以理论内在的开放性不断强化自身解释力。另一方面,马克思哲学实现的“立脚点”转换,要求自身不仅要以“密纳法的猫头鹰”的视角去反思过去;还要从历史总体出发,以“高卢雄鸡的高鸣”[③]去把握未来。任何一种理论一旦被建构起来,就不可避免地走向自我固化,进而丧失自我发展和回应现实的能力,其症结在于缺乏向理论自身开放,即自我批判的能力。与旧哲学的作茧自缚不同,“马克思这位权威人物开启了批判性研究的道路”[④],使哲学真正成为“现实的个人”的历史展现及其完成的理论表达:“用宽广视野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坚持在改革中守正出新、不断超越自己,在开放中博采众长、不断完善自己”[⑤],持续向理论自身开放,从而彻底改变了哲学“自我实现”的目标和途径。这也就是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提出的:“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哲学的实现同时也就是它的丧失”[⑥]的真实内涵。从这个角度说,马克思不仅没有抛弃哲学,而且实现了哲学在最大程度上的广义化。这一提升和拓展工作的完成,无疑正是马克思哲学以自我批判方式向理论自身开放的佐证。

六、结语

马克思哲学的开放性品格是“改变世界”这一根本任务的必然要求。凭借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马克思哲学在思维前提、层次和内容诸方面都具备了向历史总体、未来社会和现实实践持续开放的可能,并依靠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实践将这种开放性充分展现并落实下来。马克思哲学的内在批判指向,促使它在同各种思潮对话时积极吸收相关理论营养,实现自身发展。这种对历史和未来、理论和实践均保持开放姿态的哲学品质,决定了我们必须以自己“无尽的探索”来研究和阐述马克思哲学,而且这项研究本身也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完成。以开放的视角理解和对待马克思哲学,不断学习进而发展马克思哲学,是新时代学人应自觉承担起的使命。

[责任编辑:郑　毅]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02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1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8页。

④Heilbroner R. L. ,*Marxism:For and Against*,p. 18.

⑤《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76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页。